

美以伊冲突下东南亚国家安全观的 变革及其政策实践

张 洁

内容提要：继俄乌冲突、新冠疫情以及特朗普 2.0 亚太政策转向对东南亚造成一系列冲击之后，2026 年 2 月爆发的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构成新一轮复合型冲击，加速了地区各国安全观的转变与安全战略的调整。东南亚国家基于对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时代的认知，加大对传统安全的投入，包括制订、更新或升级国防战略，增加军费开支，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与无人化装备，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等。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战略仍具有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特征，对此，中国应基于国别差异和议题区别，精准研判、分类施策，以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整体稳定。

关键词：美以伊冲突 东南亚安全 大国博弈 丛林法则 安全认知

作者简介：张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研究专项（编号：24VHQ010）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中国周边研究”（编号：2023DFYSQY01）阶段性成果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80/j.cnki.ytaq.2026.5.2

文章编号：2096-0484（2026）05-0020-18

2026 年 2 月底，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随着战事延宕，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冲突的外溢效应持续扩散，东南亚地区亦被深度卷入。东南亚既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支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更是美国对华战略博弈的重点区域。因此，美以伊战争对东南亚的冲击及地区国家的应对，直接关系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乃至地区秩序的演进方向。

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各国的能源与粮食安全、经济与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东南亚国家在疲于应对这些危机的同时，在安全领域也进行了系统性调整，如制订或调整国防战略，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加大军费开支以及对重点领域的投入——特别是在人工智能与无人化设备采购、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简称 A2/AD）建设方面等，这与冷战结束后东南

亚各国更多聚焦综合安全的传统形成显著反差。

这种反差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外因看，美以伊冲突叠加俄乌冲突、特朗普 2.0 亚太政策转向，对东南亚地区形成冲击波；从内因看，东盟成员国的中小国家属性、独特的地缘禀赋以及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特殊地位等，共同构成了其战略选择的底层逻辑。

因此，当前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战略在变革中兼具延续性，总体仍呈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特征，如虽然增加军费开支但其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仍保持在较低水平，追求的是相对安全而非绝对权力，加强实力建设的同时强调合作安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多数国家的战略调整旨在加强战略自主、坚守大国平衡立场，然而也有少数国家试图借助外力在领土领海争端中增加“砝码”，对此，中国应分国别、分议题评估应对。

东南亚作为中小国家构成的地缘板块，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地区形势长期稳定，在妥处安全与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广大中小国家发挥着引领和示范效应。因此，以东南亚为个案，考察大变局下中小国家安全观的变革及其战略调整趋势，将有助于中国研判国际形势走向并精准施策。

一、美以伊冲突是东南亚各国安全认知与安全战略变化的重要外因

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的冲击涉及综合安全的各个方面，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能源与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特别是在传统安全方面，美以伊冲突作为“发酵剂”与“加速器”，与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特朗普 2.0 亚太政策转向等因素形成复合冲击波，推动东南亚国家从国际秩序、中美战略博弈、地区安全保障等更深层次上审视世界变局并采取战略应对。

（一）美以伊冲突严重冲击东南亚各国的非传统安全

作为高度开放且深度嵌入全球经贸体系的区域，东南亚多国属于能源密集型经济体，严重依赖进口。美以伊冲突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首先冲击的就是东南亚各国的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冲突爆发后，东南亚各国很快出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混乱，从电力供应不足到生产与物流成本急剧上涨，从制造业面临供应链断裂到因化肥等基本物资短缺引发粮食安全危机。正如马来西亚政府所提醒的，全球能源危机不再是短期冲击或油价问题，而是将对运输成本、物流、原料、食品及服务等环节造成影响，波及人民的日常生活。^①

^① 《物价失业率上扬 马国：中东冲突负面影响将浮现》，联合早报网，2026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ea/story20260422-8935899> [2026-06-07]。

面对挑战，东南亚各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但是短时间内从中东以外地区筹措替代货源并不能完全满足需求。随着战事持续，印尼、菲律宾等国政府的燃油价格补贴政策难以为继，国内矛盾与不满情绪积聚，对社会稳定构成挑战。例如，印尼多次发生示威游行，矛头直指政府政策不公与社会分配失衡；菲律宾国内的抗议活动则从最初要求对燃油实施价格管制、废除石油产品税以及加强国家对石油行业监管，逐步演变到对现任马科斯政府的声讨，并将菲律宾面临的困境归咎于“美国对伊朗的侵略”。^①当然，事态的发展仍需观察，但是基于南亚地区的前车之鉴——2022 年以来，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在俄乌冲突与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下相继出现社会动荡进而引发政权更迭，导致整个区域局势不稳与经济停滞——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地区的系统性冲击同样不可低估。

本文之所以关注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原因在于：首先，确保能源和粮食安全等所需投入的财政预算必然与增加军费预算形成竞争，在要经济还是要军事之间如何做出选择，是对一国安全理念的考验；其次，一旦东南亚一些国家因民生问题应对不当而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不排除该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通过炒作领土领海或海洋权益争端等方式进行“祸水外引”，从而冲击地区安全以及对华关系。因此，在研究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传统安全的影响之外，对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整体评估，仍是必要组成部分。

（二）美以伊冲突加速东南亚各国对传统安全问题的认知改变

美以伊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深了东南亚国家的战略焦虑。在全球层面，他们认为俄乌冲突与美以伊冲突标志着国际秩序重回实力政治，中小国家生存安全受到威胁；在地区层面，他们将美以伊冲突映射至亚太，担心一旦中美发生冲突或将引发台海、南海问题出现极端情境，导致本地区陷入动荡不安。此外，观察俄乌冲突与美以伊冲突，东南亚国家进一步深化了对新型战争形态的理解。

1. 东南亚国家强化对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时代的认知

当前，东南亚国家普遍担忧二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正遭遇系统性危机，面临重回“丛林法则”时代的严峻挑战，这对依靠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维护主权安全的中小国家十分不利。具体而言，在美以伊冲突中，美以擅用武力，动摇了国家主权平等、不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现有国际秩序的根基；美国和伊朗交替声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被广泛接受的自由航行理念遭遇重大冲击。美国国防部长

^① Felix Heiduk, “Philippinen: Energienotstand und Diplomatischer Balanceakt”, SWP, April 27, 2026, <https://www.swp-berlin.org/en/publication/schockwellen-nach-osten-wie-der-iran-krieg-die-politische-landschaft-asiens-veraendert#publication-article-190> [2026-06-07].

赫格塞思在 2026 年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甚至公开表示,规则固然好,但如果不能用硬实力支撑,规则就是一纸空文。^①这再次说明,世界正从“规则治理”滑向“实力治理”,中小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空间则被急剧压缩。对此,东盟在各类声明中均表达了深度关切。

2. 东南亚国家认为自身处于大国博弈与“丛林法则”双重挤压的不利环境

当前形势下,东南亚国家认为“东盟中心地位”面临挑战,甚至本地区被动卷入战争的风险也在显著上升。具体而言,冷战结束以来,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逐渐确立,其实现的重要外部条件是,大国之间具有合作意愿而非以竞争关系为主;东盟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大国对东盟地位的认可。^②

随着中美关系的紧张,特别是 2018 年以来美国对华展开全面战略竞争,东盟中心地位得以存续的外部条件逐步恶化。不仅如此,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奉行以“唐罗主义”为核心的外交理念,强调通过军事干预、经济胁迫与政治操控重塑区域霸权,在对华博弈中主张“以实力求和平”,这些均标志着大国竞争重回传统权力政治轨道。而美以伊冲突的升级使新加坡等国家认为,一旦大国关系破裂并在太平洋地区爆发冲突,当前在霍尔木兹海峡所目睹的一切,恐怕仅仅是一场预演。因此,如何在极端情境下被迫“选边站”时维系战略自主,将成为东南亚国家面临的严峻考验。^③

3. 美以伊冲突加大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质疑

多数东南亚国家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提供的安全保障是本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2025 年底美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号称将以美国本土和西半球作为安全优先事项,引发了东南亚关于美国是否还会保留“印太战略”的焦虑。即使美国“留在”亚太,但在“美国优先”与“实用主义”的底层逻辑主导下,特朗普第二任期正将双边关系全面“交易化”,不仅在经济上通过对东南亚各国征收“对等关税”进行极限施压与利益榨取,在安全上也强推责任分担,要求各国承担更多军费及防务成本。这种高度交易化的战略,实质上正在透支美国在该地区的信誉,迫使东南亚国家加速寻求战略自主与多元化避险。

例如,在 2026 年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虽表面点名称赞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大力投入国防建设,

① Pete Hegseth,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Peace in the Indo-Pacific”, IISS, May 30, 2026, <https://web-opti-prod.iiss.org/ar-BH/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26/plenary-sessions/first-plenary/> [2026-08-03].

② 参见韦宗友:《印太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及美国—东盟关系挑战》,《南洋问题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8 页。

③ 《维文:中美关系若破裂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恐“只是预演”》,联合早报网,2026 年 4 月 23 日, <https://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260422-8933685> [2026-06-07]。

协助分担责任,但其实质是在持续施加压力,要求各国将军费投入增加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3.5%。他表示,“美国资助富裕国家防务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需要的是伙伴,不是受保护国,美国组建的联盟是基于共同责任而非依赖”。^① 这就迫使东南亚国家必须面对“残酷”现实,未来将无法继续享受美国提供的免费安全保障。

不仅如此,美以伊冲突发生后,美国将部署在菲律宾、韩国等地的大量战略资源向中东转移,进一步引发东南亚国家对于“印太”区域战略平衡与防御能力的忧虑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度的质疑,即美国生产武器装备的能力是否足以支撑亚太地区的另一场战争。^② 这无疑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最终安全保障”赤字战略焦虑,也加速了他们安全观的转变。

4. 美以伊冲突推动东南亚各国对新型战争形态的深度观察与战略反思

美国与以色列在战争初期对伊朗的袭击以及“斩首行动”,凸显低门槛、大情报、高科技、无底线的特征,^③ 这既使东南亚国家看到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武器装备相结合的新型战争形态的“威力”,也使他们感受到国家生存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

无人设备系统在俄乌冲突与美以伊冲突中的大规模应用,促使东南亚国家思考以非对称手段弥补军事实力差距的战略路径。例如,伊朗利用相对原始的技术(包括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突破美国在海湾的防空系统,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导致美国战略上陷入被动;^④ 乌克兰通过武器装备升级不断改变战争进程。这些案例均表明,无人机的使用可以大幅增加对手防御体系的应对成本。因此,更快、更低成本的无人设备实现了对先进昂贵军事平台的部分替代,使小国在面对综合实力强大的大国时,能够凭借非对称作战手段获取更多战略优势。

5. 海峡过境通行权议题引发东盟内部的分歧

东南亚各国应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出现差异化。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政府为了确保本国船只顺利通过海峡,倾向于与伊朗展开谈判,而新加坡则主张坚守国际法原则,重申不同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付费通行。^⑤

① Pete Hegseth,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Peace in the Indo-Pacific”, May 30, 2026, <https://web-opti-prod.iiss.org/ar-BH/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26/plenary-sessions/first-plenary/> [2026-08-03].

② 《美军武器与兵力大举调往中东 印太防线拉响“真空”警报》,联合早报网,2026年3月18日, <https://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260317-8748733> [2026-06-07].

③ 参见廖百智:《美以伊战争加快中东地缘政治格局重构》,《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4期,第11页。

④ 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廖百智、唐志超、陈文鑫、陆如泉、陈庆鸿:《美以伊战争:中东地缘博弈与全球冲击》,《现代国际关系》2026年第4期,第5—30页。

⑤ 《维文:中美关系若破裂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恐“只是预演”》,联合早报网,2026年4月23日, <https://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260422-8933685> [2026-06-07].

沿岸国对马六甲海峡管理方式也出现了分歧。马六甲海峡作为全球贸易咽喉要道，在霍尔木兹海峡事态升级后备受关注。印尼财长曾一度表示，印尼或可参照伊朗的做法，对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船舶征收通行费，并建议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三方分摊收益。^①此言一出，立刻在印尼国内与东南亚内部引发激烈争论。例如，新加坡明确表示反对，声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习惯国际法都确立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过境通行权，这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因此，新加坡不会参与任何关闭、拦截，也不会有在邻近海域收取过路费的企图。^②

综上，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地区产生复合型冲击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内部因素而言，东南亚具有能源安全的脆弱性、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以及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一方面，该地区多国属于能源密集型经济体且高度依赖进口，能源供应链极易受外部波动影响；另一方面，该地区经济高度开放，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对外部环境变化极为敏感。此外，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印度洋枢纽地带，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既是东南亚国家的能源生命线，更是美国“印太战略”的要冲。因此，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南亚地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中东战事与大国博弈的双重挤压，承受着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多重压力。加之区域内各国不仅要维护本国利益，还要在东盟框架内进行立场协调，以维护东盟的统一性与“中心地位”，这进一步增加了政策协调与危机应对的难度。

二、变革与延续：美以伊冲突下东南亚各国安全观的演进

冷战结束至今，尽管东南亚各国在国家实力、安全关切、路径选择等方面具有多样性，但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宪章》等制度框架下，随着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持续推进，各成员国就安全理念达成广泛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地区安全观，即东盟安全观。对此，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并将东盟安全观的特点概括为“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③理解东盟安全观的既有特性，才能理解当前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时代对东盟的冲击之大。

① “Purbaya Floats, then Downplays Malacca Strait Levy Idea”, The Jakarta Post, April 23, 2026, <https://jatim.antaranews.com/berita/1060247/indonesia-rules-out-tax-on-ships-passing-malacca-strait> [2026-07-07].

② 《吴俊刚：从霍尔木兹到马六甲海峡》，联合早报网，2026年4月29日，<https://www.zaobao.com/forum/views/story20260428-8966196> [2026-07-07]。

③ 参见曹云华：《东南亚国家“海权观”的建构和变化分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3期，第4—10页；曹云华：《新、马、泰三国安全战略剖析》，《东南亚》1995年第2期，第55—60页；韦红：《东盟安全观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第27—34页；马银福：《东盟安全观的演变、特点及成效》，《南亚东南亚研究》2024年第2期，第81—101页；赵毅：《差异性与多样性：东南亚国家对国家安全的认知》，《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5期，第90—103页。

同时,理解东盟安全观对于把握东南亚各国安全观转变与安全战略调整的基本逻辑与限度也必不可少,毕竟这种变化兼具延续与革新,而非完全的“破旧立新”。

(一) 既有东盟安全观与地区实践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首先,《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奠定了东盟安全观的核心理念基础。东盟成立于 1967 年,创立之初东盟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成员国内部的矛盾和争端。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东盟推动成员国签署《东盟协调一致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一系列文件,标志着成员国就尊重各国政治安全、成员国之间和平相处的基本准则达成一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它至今仍是东盟各国遵守的根本准则,也是域外国家或组织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其主要内容包括: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各国的民族特性;任何国家都有免受外来干涉、颠覆和制裁、保持其民族生存的权利;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分歧或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缔约各国间进行有效合作。^①

其次,综合安全是东盟安全观的鲜明特征。东南亚国家长期强调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重要性,正如《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指出的,在建设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平与有韧性的政治安全共同体时,东盟赞同综合安全的原则,这不仅超越了传统安全的要求,也考虑了涉及区域和国家韧性的至关重要的非传统方面,如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发展层面。^②在综合安全中,政治安全仍然是核心,经济安全是基础,其他非传统安全是治理的主要内容,而传统安全则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究其原因,按照新加坡等国的表述,冷战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而经济繁荣又进一步夯实了本地区的安全稳定。

最后,构建一系列自身主导的地区机制是东盟维护地区安全与战略自主的重要保障。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对立,到冷战后中美长期的竞合并存,再到近年来不断加剧的中美战略博弈,由于地理位置重要,东南亚长期处于大国博弈的漩涡之中,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战略挤压,而保持大国平衡、避免“选边站”是东盟作为中小国家集合体长期遵循的生存之道,正如有学者指出,东盟希望通过大国承诺而非相互制衡、竞争来保证地区安全。^③为此,东盟努力加强自身统一性,通过构建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

① 至今,东盟官方网站在显要位置详细、清晰地列出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主要内容,参见 <https://asean.org/what-we-do#fundamental-principles> [2026-08-04]。

②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APSC_BluePrint.pdf [2026-08-03]。

③ 参见韦红:《东盟安全观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第 29 页。

亚峰会等对话机制，确立了自身在区域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上述分析只是对东盟安全观的基本概述，实际上，东盟安全观既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传统的实力均衡安全观，又不能简单被定性为完全意义上的合作安全观，而是更具复杂性和包容性，如多边主义的框架与单边主义的兼容、综合安全的强调与政治安全的优先、区域自治与域外大国承诺保证的互补等。^①而正是这些特性决定了当东盟国家面临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以及特朗普 2.0 亚太政策转向等一系列冲击时进行战略调整的底层逻辑。

（二）东南亚国家安全观转变的主要表现及其特点

面对大国博弈加剧、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东南亚各国的安全观发生明显变化，主要包括：从过去更多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转变为加强军事实力的战略自主，从过去聚焦于综合安全重新向传统安全回归。而不变的内容则表现为维护现行国际秩序，以及东盟在区域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

1. 强调以军事能力建设支撑战略自主

有鉴于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的深刻启示，东南亚国家普遍认为，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险时代”，武装冲突将继续对全球稳定产生直接影响。而当今世界变成“强权即公理”，多边主义和联合国的作用遭到削弱，保障地区安全与繁荣的开放型世界秩序机制正受到侵蚀。因此，作为中小国家，拥有强大可靠的国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②寻求扩张军备、维护自身安全成为各国普遍选择。

东南亚国家认为中美关系的变化将决定未来地区秩序的走向，他们需做好战略准备。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共存与合作是东盟确立“中心地位”的重要条件。但是，随着 2018 年后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及其对东盟中心地位的冲击，地区国家的战略焦虑显著增加，即使当前中美正在努力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种焦虑也并未减少。新加坡认为，由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两国集团”（G2）秩序正在形成，无论中国愿意与否，G2 在实质上都是存在的，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看待中美关系。而中美之间的任何决定，都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深远影响。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就能为其他国家创造更多回旋的空间与机遇。^③但是东南亚国家也担心，如果中美战略博弈进一步加剧甚至爆发地区冲突，不仅会破坏亚太繁荣，而且将迫使他们不得不“选边站”，

① 参见韦红：《东盟安全观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6 期，第 27—34 页。

② 《新加坡武装部队开发“高低搭配”战力体系，从高端新型军事装备到低成本无人机》，2026 年 2 月 27 日，https://defencepioneer.sg/pioneer-articles/27feb26_news2_zh [2026-07-15]。

③ 《陈庆珠：小国同样拥有自主权与能动性》，联合早报网，2026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zaobao.com/forum/views/story20260712-9352222?ref=home-opinion> [2026-07-15]。

特别是那些关键水域或通道的沿岸国家。还有一种情况则是,世界未来或许会分为不同的权力地区,中美各有主导,而局部地区再有局部地区大国主导。^①而在形成这一格局的过程中,大国要经过激烈博弈,东南亚地区国家也不免面临“选边站”。故而,东南亚各国必须密切关注中美关系变化并多领域、全方位构建“保险政策”,以应对地区之变。因此,强化战略自主成为东南亚国家安全观转型的核心内容,目的是通过实力建设,弱化对域外安全承诺的依赖,同时在大国竞争压力时能够避免被迫“选边站”。

2. 传统安全议题重新凸显

过去多年,东南亚各国更多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因为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长期构成东南亚各国面临的现实且紧迫的安全挑战,而在大国提供地区安全保障承诺的庇护下,传统安全问题相对被忽视。然而,近年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以伊冲突,将“生存安全”重新推至东南亚国家安全议程的核心位置,政权安全、军事现代化建设等传统安全议题随之被纳入优先议程,各国纷纷制订或更新国防战略规划,加大军费开支以推动军备更新换代,通过增加本国国防能力的韧性以适应新型战争形态变革以及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3. 秩序观的坚守与调适:国际规则、“中心地位”与东盟方式

东南亚国家安全观中坚守不变的基本原则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遵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与国际规则,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宪章》等。

因此,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美以伊冲突,战事爆发后东盟都在第一时间发声,谴责冲突方滥用武力破坏地区和平。2026 年 3 月,针对美以伊冲突,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中较为罕见地直接点名,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袭击以及随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该地区几个国家(包括巴林王国、约旦哈希姆王国、科威特国、阿曼苏丹国、卡塔尔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动的报复性袭击后,东盟对中东冲突升级表示严重关切”,并重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按照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②7 月,东盟外长会议再次发表声明,强调在解决冲突和缓和紧张局势时,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维护国际法以及促进真正的对话和外交的重要性,包括需要立即

① 《韩咏红:中美会在东西半球分势力区吗?》,联合早报网,2026 年 1 月 10 日, <https://www.zaobao.com/news/china/story20260110-8079413> [2026-07-25]。

②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IA, March 04, 2026, <https://pia.gov.ph/news/asean-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the-situation-in-the-middle-east/> [2026-06-25]。

彻底停止中东各战线的敌对行动。^① 在国家层面，泰国表示这场战争本不该发生，新加坡将美国称为“修正主义大国”，印尼暂停了所有关于加入美国倡议建立的“和平委员会”的讨论。^② 对此，欧洲学者认为，“这是该地区历史上一直是美国最可靠朋友的那些政府发出的严肃信号”。^③

由地缘特征所决定，东南亚国家特别关注海上通道问题。美国与伊朗在2026年4月达成停火协议后，东盟外长发表了联合声明，特别指出“应重申根据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和国际海事组织（IMO）的相关标准和建议，维护海上安全和安保，维护国际航行和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上空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④

二是保持东盟长期实践所形成的地区经验。这包括强调协商一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非正式性和灵活性的“东盟方式”（ASEAN Way）；维护东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以提升东南亚整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继续将东盟主导下的一系列对话机制作为加强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坚持大国平衡，避免“选边站”，同时也防止任何单一大国主导地区事务；重视合作安全，通过建立互信与多边协商来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等等。例如，在2026年7月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东盟外长会议专门举行了有关《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东盟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美国等举行“10+1”部长级磋商，就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等议题与主要域外国家达成新共识，东盟地区论坛如期举行并形成《东盟地区论坛马尼拉行动计划（2026—2036）》（ARF Manila Plan of Action, 2026—2036）^⑤ 等文件。在当前大国关系紧张、多边有效合作受阻的背景下，“10+n”的对话与合作形式展现了东盟的灵活性，也体现了东盟“中心地位”的现实价值。

①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the Evolving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SEAN Homepage, July 21, 2026,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6/07/FINAL-ASEAN-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the-Evolving-Situation-in-the-Middle-East-1.pdf> [2026-07-05].

② “Indonesia Pauses Talks on Board of Peace amid Iran Conflict”, The Strait Times, March 04, 2026,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jakartas-talks-on-board-of-peace-on-hold-amid-iran-conflict-says-indonesia-foreign-minister> [2026-07-15].

③ Rameen Siddiqui, “Is America Actually Losing Southeast Asia to China in 2026?”, Modern Diplomacy, May 19, 2026, <https://moderndiplomacy.eu/2026/05/19/is-america-actually-losing-southeast-asia-to-china-in-2026/> [2026-07-25].

④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Statement on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ASEAN, April 13, 2026, <https://asean.org/asean-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the-developments-in-the-middle-east/#advSearch-popup> [2026-07-20].

⑤ “ARF Manila Plan of Action”, ASEAN, July 25, 2026, <https://asean.org/arf-manila-plan-of-action-2026-2036/> [2026-08-05].

三、东南亚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东南亚各国安全认知的重塑并非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迅速落实到国防战略规划、装备采购、军事外交多元化等具体实践中。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东南亚各国的长期任务，早在冷战结束初期，面对地区安全秩序的重组，东南亚国家就提出了建设军事现代化、加强防务合作等目标。^① 当前，面对新一轮国际与地区形势变化，东南亚国家赋予军事现代化以新的内涵，涉及军队结构改革、国防工业自主化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应用等。同时，多数东南亚国家仍秉持合作安全理念，强调开展多元化军事外交的必要性。

（一）国防政策的更新升级

近年来，东南亚各国普遍制定、升级或是更新了本国的国防战略。例如，新加坡国防部长指出，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带来的最大启示是，现代战争比拼的不只是战术、武器和科技，更包括国家和军队持续作战的能力，尤其是后勤、供应链和整体韧性。为此，新加坡国防部 2026 年 5 月新成立“新加坡国防志愿者联系网”（SG Defence），将社会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纳入国防体系，从而建立更广泛的全面防卫韧性。^② 此外，新加坡虽未制订新的国防战略，但以 2023 年其武装部队发布的“锻造军刀”（Forging Sabre）项目为代表，持续推动以人工智能驱动国防转型为发展方向与核心特征的军事现代化建设，旨在实现数字化升级、机器人水平提升、传感器革命三大要素的协同效应。分析认为，在此之前的新加坡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进程均强调提升常规军事能力，因此由人工智能驱动的“SAF 2040”计划将是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军事现代化进程。^③

马来西亚首部《国防白皮书》于 2019 年 12 月经议会通过，2020 年 2 月由国防部正式发布，规划期为 2021 年到 2030 年。按照既定政策周期，国防部于 2024 年启动中期审核程序，并于 2025 年 9 月发布中期审核报告（MTR）。该报告重新评估了马来西亚面临的安全环境，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俄乌冲突、中东冲突、大国竞争、亚太海洋争端、武器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传统安全的影响，

① 参见曹云华：《后基地时代的菲律宾安全观与防务政策》，《东南亚研究》1997 年第 5 期，第 37 页；关于东南亚各国军事现代化的研究，还可参见：格里高利·文森特·雷蒙：《东南亚的海军现代化：处于陆军霸权的阴影下？》，《南洋资料译丛》2018 年第 2 期，第 17—27 页；刘琳：《东南亚国家军事现代化：动因、制约与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100—118 页。

② 《现代战争比拼供应链韧性 陈振声：新加坡须有实力“站在自己这一边”》，联合早报网，2026 年 7 月 3 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260703-9284861> [2026-08-13]。

③ Michael Raska, “Reimagining Defense Innovation: Defense AI in Singapore”, in Heiko Borchert et al. eds., *The Very Long Game: 25 Case Studies on the Global State of Defense AI*, Cham: Springer, 2024, p. 560.

提出了强化国防的关键举措,包括加强威慑、全面防御和构建可信赖的伙伴关系三大支柱,以及在此基础上加强国防科技、推动国防工业发展以及变革国防管理体制等。中期审核还提出了将武装部队发展为“联合网络中心一体化多域力量”的战略方向。^①

2026年7月,越南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将安全置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格局之中,主动未雨绸缪地识别、预测、预防和处置传统、非传统、跨学科及跨境的风险;坚决捍卫党、制度、国家、人民、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确保人身、数据、能源、水资源、粮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②会议期间,越共还发布了第22-NQ/TW号决议《国家安全战略》,决议要求坚决保护国家安全、人民安全、制度安全、各领域和太空安全等,同时还包括及早防范和遏制来自内部、网络空间、宇宙空间、低空空间、海洋和大洋的不稳定因素,^③体现了越南对新型安全风险的防范意识,以及其国家安全防御内容的不断扩展。

2012年,菲律宾政府提出了一个为期15年的武装部队现代化计划,即“地平线”(Horizon)计划,并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由于前两个阶段未能按计划完成,现任马科斯政府着手对第三阶段进行修订。2024年1月,菲律宾国防部宣布批准修订后的“重建地平线”(Re-Horizon 3)计划,将其作为本国武装部队现代化建设的第三阶段。该计划声称将在十年内投资350亿美元,用于收购陆地、空中和海洋资产,包括购买多用途战斗机(MRF)、海上巡逻艇、导弹护航器、快速攻击艇等先进装备。^④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计划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将中国视为“假想敌”的安全认知上。

(二)“非对称”转向:智能化装备升级与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

第一,近年来,东南亚主要国家军费开支快速增加。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估计,2026年亚洲国家国防开支将比2025年实际增长3.4%。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和泰国五国2026年国防开支合计约420亿美元。

① Kuik Cheng-Chwee, “Malaysia Reassesses Security: The Mid-Term Review of the Malaysian Defence White Paper”, ISEAS Perspective, February 11, 2026,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6/01/ISEAS-Perspective_2026_11.pdf [2026-07-25]; “Supporting Malaysia’s Defence White Paper Mid-term Review”, The Strait Times, October 28, 2025, <https://www.nst.com.my/opinion/columnists/2025/10/1303697/supporting-malaysias-defence-white-paper-mid-term-review> [2026-07-25].

② 《越共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 Vietnam+, 2026年7月24日, <https://zh.vietnamplus.vn/article-post265820.vnp> [2026-08-04].

③ “Nghị quyết Hội nghị lần thứ ba Ban Chấp hành Trung ương Đảng khóa XIV về chiến lược an ninh quốc gia”, August 03, 2026, <https://pbgdpl.cantho.gov.vn/ngphi-quyet-hoi-ngphi-lan-thu-ba-ban-chap-hanh-trung-uong-dang-khoa-xiv-ve-chien-luoc-an-ninh-quoc-gia> [2026-08-04].

④ “Security Sector Modernization Makes PH Stronger Self-reliant”, Philippine News Agency, March 06, 2025,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45495> [2026-07-25].

其中增长最快的是菲律宾和印尼，其次是新加坡和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的增速相对温和。^① 不过，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仍约为 1.5%，远低于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印太”盟友提出的 3.5% 的要求。例如，印尼 2026 年国防支出预算约为 107.8 亿美元，仅占 GDP 的 0.8%。^② 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中武器装备最先进的，2026 年国防预算为 195 亿美元，占 GDP 约 2.86%。^③

第二，人工智能赋能军事现代化成为重点。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所展现的新型战争形态，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将网络、太空、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领域从“未来展望”变为“当前重点”的动力。他们以建设海、空军为重点，将采购重心从传统平台（战机、护卫舰）转向无人化、智能化装备。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则强调同步建设无人机作战与反无人机能力，通过升级装备、采购与自主研发并举，加强低空监视体系、数据融合、指挥控制整合、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及快速响应能力建设。^④

新加坡较早尝试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防御，发挥其作为“情报赋能工具、技术颠覆者与力量倍增器、国防外交基石”的支柱性功能。^⑤ 2025 年，新加坡开始接收“赫尔墨斯 900”（Hermes 900）无人机以替换旧款，这是新加坡武装部队“SAF 2040”转型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提升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能力。新加坡时任国防部长黄永宏表示，新加坡计划发展“高低搭配”的战力体系，即以商业市场上可用的低成本无人机等设备补充高端常规系统，有助于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战场与技术环境。^⑥ 2026 年 2 月初，越南国防部与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签署了价值约 2.5 亿美元的协议。该协议的核心是采购“长钉萤火虫”（Spike Firefly）巡飞弹系统，并包含完整的技术转让和在越南本土建立生产线的条款。这一举措符合越南的国防采购政策，即鼓励国内制造业生产、减少对外部供

① Lucie Béraud-Sudreau, “Asian Defence Spending in 2026: Growth under Fiscal Constraints”, IISS, May 19, 2026, <https://www.iiss.org/ja-JP/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6/05/asian-defence-spending-in-2026-growth-under-fiscal-constraints/> [2026-07-25].

② “Draft TNI Regulation on Funding Raises Concerns over Military Neutrality”, The Jakarta Post, May 08, 2026,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opinion/2026/05/08/analysis-draft-tni-regulation-on-funding-raises-concerns-over-military-neutrality?utm_medium=single_relatedarticles&utm_source=%28direct%29 [2026-07-25].

③ “Singapore Announces Defence Budget Increase”, JEANS, February 2026, <https://www.janes.com/defence-intelligence-insights/defence-news/industry/singapore-announces-defence-budget-increase> [2026-07-22].

④ 《东南亚多国构建反无人机体系》，人民网，2026 年 6 月 5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6/0605/c10111-40734500.html> [2026-07-22].

⑤ Michael Raska, “Reimagining Defense Innovation: Defense AI in Singapore”, in Heiko Borchert et al. eds., *The Very Long Game: 25 Case Studies on the Global State of Defense AI*, Cham: Springer, 2024, p. 560.

⑥ 《新加坡武装部队开发“高低搭配”战力体系，从高端新型军事装备到低成本无人机》，PLONEER, 2026 年 2 月 27 日，https://defencepioneer.sg/pioneer-articles/27feb26_news2_zh [2026-07-22].

应商的依赖。^① 2026 年菲律宾的军费支出预算增加了 12%，声称将用于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先进且具有互操作性的部队，能够与美国军队并肩作战”。^②

此外，印尼、菲律宾、越南相继签署协议或已经购买了印度生产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些采购的共同指向是打造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即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构筑针对海空优势力量的威慑边界。^③ 关于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是否会发展为区域性战略，即由几个国家共建，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三）继续推进多元化军事外交合作

多元外交与大国平衡是东南亚各国安全战略的“一体两面”。面对大国博弈的加剧，多数东南亚国家努力通过多元化战略，维持大国平衡立场，缓冲不断加大的“选边站”压力。东南亚国家普遍重视安全领域的多元化、开放性合作，包括参与东盟主导的各类对话平台，有意识地增加联合军事演习的合作伙伴数量和合作伙伴类型，甚至在军备采购方面也倾向多元化来源与合作。

东南亚国家的国防政策多强调合作安全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例如，新加坡明确指出其国防政策的根基是“威慑”和“外交”双支柱，国防外交应通过与本地区和世界各地的国防机构及武装部队建立牢固友好的联系，从而为国家的和平、安全与繁荣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④ 马来西亚国防白皮书中期审核报告也强调，要重视在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五国防务安排等国际平台上发挥积极作用，要积极参与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因为现代防御不能孤立地规划，必须由各方共同发展。^⑤ 越南则长期奉行“竹子外交”，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对话机制的同时，不断加强与美国、日本在海警和海军领域的合作，试图建立更广泛的安全合作机制。

当然，也有例外，即马科斯政府领导下的菲律宾。当前，菲律宾依托与美国的同盟体系，不断增强和扩大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军事联系和海上军演等活动，试图借助外力维护其对南海的非法海洋权益主张。菲律宾还先后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等签署《访问部队地位协议》或

① “Vietnam Procures Rafael’s L SPIKE1X Loitering Munitions in \$ 250M Defense Deal”, Israel Defense, February 09, 2026, <https://www.israeldefense.co.il/en/node/67752> [2026-07-22].

② Pete Hegseth,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Peace in the Indo-Pacific”, IISS, May 30, 2026, <https://web-opti-prod.iiss.org/ar-BH/events/shangri-la-dialogue/shangri-la-dialogue-2026/plenary-sessions/first-plenary/> [2026-08-03].

③ 《东南亚多国构建反无人机体系》，人民网，2026 年 6 月 5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1/2026/0605/c1011-40734500.html> [2026-07-22].

④ “Defence Policy and Diplomacy”, Mindef, Last Updated July 14, 2026, <https://www.mindef.gov.sg/defence-matters/defence-topics/defence-policy-and-diplomacy/> [2026-07-26].

⑤ “Mindef Rolls Out Five-year Strategic Defence Plan”, The Strait Times, June 26, 2026, <https://www.nst.com.my/news/nation/2026/06/1472968/mindef-rolls-out-five-year-strategic-defence-plan> [2026-07-22].

《互惠准入协议》，意在为外国军队在菲律宾进行联合演训提供法律框架。但是，由于菲律宾放弃了前提条件，即大国平衡政策和拒绝“选边站”，甘心加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的对抗性阵营，其安全政策引发国内不同派别的批评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不同看法。

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也为东南亚各国开展军事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截至 2026 年 7 月，共有 62 个国家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意味着世界上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家承诺遵守该条约的基本原则。^① 而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会议、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机制，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覆盖国家最多、最重要的对话平台，对于东盟国家开展与各方对话交流、增强战略互信、推动军事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本身也是东盟国家强化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资产之一。

四、东南亚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成效评估及其发展前景

东南亚国家正在进行的安全战略转型是其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这一转变根植于地区国家对国际秩序重回“丛林法则”时代的集体焦虑，亦是对大国博弈加剧、地区热点升温及传统安全机制失效风险的前瞻性回应。然而，战略意愿与能力建设之间的落差、东盟集体行动机制的退化，以及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在区域内的不均衡发展，预示着这场变革必定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战略调整的性质与目标

基于对国际秩序重回无政府状态的判断，东南亚各国普遍认为自身面临的安全威胁正在显著增加，由此推动的安全观转变呈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鲜明特征。其一，战略目标聚焦于维护本土生存与核心利益，而非追求绝对权力；其二，在加强军备建设的同时，仍坚持合作安全不可或缺；其三，实践中遵循大国平衡、避免“选边站”、与域外国家开展多元外交的三原则。

在战略目标层面，东南亚国家的安全战略调整存在国别差异。第一类国家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保持战略独立性作为安全关切的基本盘，这也是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选择；第二类国家重点关注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可能引发的地区热点冲突，特别是在关键水域方面持中立态度，这是部分国家特别是海岛东南亚国家的重点关切。

两大关键性议题推动东南亚各国国防战略的转型。一是新型战争形态变革促使各国改变军备偏好，加速国防力量的数字化转型，并开始投资无人系统等

^① “PH Marks 50 Years of ASEAN Treaty of Amity; 4 New Parties Accede”, Philippine News Agency, July 24, 2026,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280277> [2026-07-26].

新兴领域；二是面对大国博弈加剧与地区热点突发情景，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正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战略选项。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评估东南亚各国安全战略调整的地区影响，区分上述两类战略目标非常重要。

（二）实施成效与面临的挑战

加强军事现代化建设是东南亚各国安全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从新加坡、越南与马来西亚等国的战略举措来看，各国不仅借助军备采购加速推进军事实力建设，而且力图实现军工产业的自主研发与制造，形成可持续的军事实力积累。然而，各国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是国防预算开支问题。新加坡外长表示，新加坡将坚持马六甲海峡开放，因此每年会将 GDP 超过 3% 用于国防。^① 但除此之外，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国防开支占比很难达到这个比例。同时，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评估，随着美以伊冲突的延宕，亚太各国经济增速或将放缓，增加军费开支与解决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的预算需求之间的张力将进一步加剧。这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不得不进行取舍。

其次，更深层的挑战是各国国防生态系统中存在的结构性差距。以马来西亚为例，其国防白皮书中期审查揭示了一系列结构性顽疾：战略与条令之间的差距、国防需求与预算约束之间的差距、政府愿景与部门间壁垒之间的差距、联合力量整合与军种间动态调整之间的差距，以及国防规划与系统性腐败之间的差距。这些沉疴旧疾制约着战略意愿向实际能力的转化。^② 而这些问题是东南亚各国普遍存在的。

最后，在东盟层面，整体性应对不足同样突出。针对本地区主要潜在冲突热点，东盟系统性的讨论与应对规划仍较为薄弱。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部长级会议和宣言远多于实际行动，而未来相关的地区治理合作有可能进一步被大国间围绕传统安全议题的博弈所边缘化。

（三）安全战略转型的外溢效应

基于东南亚国家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其提升军费预算、推进军事现代化以加强战略自主，在整体上有助于维护其自身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东盟总体上坚持大国平衡、拒绝“选边站”，这对于构建开放、包容、合作的地区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有助于对冲美国同盟体系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阵营对抗的战略企图，因此中国始终支持东盟在地区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东盟应

① 《维文：中美关系若破裂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恐“只是预演”》，联合早报网，2026 年 4 月 23 日，<https://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260422-8933685> [2026-06-07]。

② Kuik Cheng-Chwee, “Malaysia Reassesses Security: The Mid-Term Review of the Malaysian Defence White Paper”, ISEAS Perspective, February 11, 2026,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6/01/ISEAS-Perspective_2026_11.pdf [2026-08-04]。

该、也可以成为维护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战略支撑。

但是,对于具体议题、具体国家的战略意图则需要具体分析、具体研判。目前来看,在东南亚国家当前的安全战略调整中,关于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建设的讨论值得特别关注。^①所谓反介入是指拥有远程作战能力,旨在防止前进的敌军进入作战区域;所谓拒止或称区域拒止,是指打击距离较短,在自身无法获得某区域优势或控制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以限制对手或敌方的军事活动和行动自由。^②有关反介入/区域拒止,初期相关研究场景多是大国间的战略竞争,但近年来关于中小国家在特定区域使用反介入/区域拒止、对大国形成非对称优势的实践及其相关研究正在逐步增多。关于东南亚国家在特定海域,如南海、马六甲海峡,强化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讨论,则是新近出现的话题,并且正在成为国外学术界和东南亚国家决策层关注的议题。^③其出发点是,面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可靠性以及大国博弈可能引发的极端情境,东南亚国家应考虑建立一套自主的防御体系,特别是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网络化建设。^④相关研究报告还指出,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反介入/区域拒止不是“争霸工具”,而是“生存保险”和“不对称杠杆”。^⑤利用无人机等低成本设备,沿岸国通过强化对诸如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水域的控制能力,能够防止在战争状态下大国对这些关键水域的抢夺与控制,从而确保沿岸国有能力坚持中立立场。

不过从实践层面来看,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尚未在东南亚各国形成联动效应。对此,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报告指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在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与能力方面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各国在战略、作战、战术和技术层面缺乏连贯、一致和系统性的规划,而且发展很不均衡,短期内将其整合到地区防御设计中仍困难重重。因此,就其

① 鉴于南海问题的现状、各方的战略诉求与立场都相对清晰,本文在这里不再做专门的讨论。

② 参见胡波:《从追求优势到接受均势:海洋多极与美国海上战略的重构》,《外交评论》2026年第3期,第32页。

③ 近期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Soul Park,“Arming the Archipelago: Explaining A2/AD Diverg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Pacific Review*, in press; Evan Laksmana,“Contingent Capabilities: Southeast Asia’s Emerging Anti-access Environment”,IISS, February, 2026, <https://www.iiss.org/research-paper/2026/02/contingent-capabilities-southeast-asias-emerging-anti-access-environment/> [2026-08-04]; Tharishini Krishnan,“Missiles over Fleets: How A2/Ad is Redefining Maritime Power in Southeast Asia”,AMTI, January 21, 2026, <https://anti.csis.org/missiles-over-fleets-how-a2-ad-is-redefining-maritime-power-in-southeast-asia/> [2026-08-04].

④ Tommy Chai,“After America: How Southeast Asia can Defend Itself”,Lowy Institute, March 30, 2026,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after-america-how-southeast-asia-can-defend-itself> [2026-07-22].

⑤ Evan Laksmana,“Contingent Capabilities: Southeast Asia’s Emerging Anti-access Environment”,IISS, February, 2026, <https://www.iiss.org/research-paper/2026/02/contingent-capabilities-southeast-asias-emerging-anti-access-environment/> [2026-07-22].

对地区安全环境产生的复杂影响仍需观察。

鉴于新加坡外长维文强调新加坡将坚持马六甲海峡开放，而且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三国已建立合作机制，重申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维护通道安全，因此，三国建设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在短期内对中国来说是相对有利的。但是，挑战同样显著。由于各国扩军计划缺乏多边协调，叠加侦察预警装备密度上升，预计海上意外相遇及摩擦频率或将增加。此外，部分研究报告也建议南海沿岸国加强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建设，以此服务于东盟南海当事国固化非法占有的南海权益。^①就此而言，其对中国维护南海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来说，危害性不言而喻。

五、结语

美以伊冲突对东南亚的冲击，并非孤立的地缘事件，而是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特朗普 2.0 亚太政策转向等一系列全球性变局对东南亚复合型冲击的延续与叠加。这些事件共同导致了当前的全球乱局，而美以伊冲突则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加速器”与“放大镜”的作用，它既放大了东南亚国家在能源安全、经济稳定和民生保障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脆弱性，也增强了各国对“丛林法则”回归、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下降以及新型战争形态变革的认知深化。

在这一认知驱动下，东南亚国家将注意力重新聚焦于传统安全，强调通过强化军事能力建设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战略自主的重要性。进而，这种安全观指导东南亚各国纷纷推动国防战略的制度化更新、军事能力建设的非对称转型以及安全合作的多元化布局。然而，这一战略调整的实效又受到多重因素制约，使得这一转型的最终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国家的战略调整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挑战在于，部分国家尤其是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以中国为“假想敌”，且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可能加剧南海地区的紧张态势。机遇则在于，多数东南亚国家仍然坚持大国平衡与战略自主的基本立场，拒绝“选边站”。鉴于此，中国宜分国别、分议题进行精准研判与应对，在把握东南亚国家安全观依然保持防御性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和双、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引导地区安全合作，同时争取这些国家在关键安全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以维护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总体稳定。

(收稿日期：2026-06-25，责任编辑：张诗昇)

^① Soul Park, “Arming the Archipelago: Explaining A2/AD Diverg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acific Review*, in press.

Abstracts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Reviving Sea Power / Lou Chunhao / 1

Taking America First a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rump's second term incorporates the "revitalization of U. S. maritime dominance" into the framework of economic security and external strategy, advancing the sea power revival through a three-pronged approach comprising industrial support, military buildup, an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sea power revival policy represents a maritime-domain extension of i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agenda and its policy of intensifying strategic competition against China. While it continues the emphasis on maritime power witnessed in previous U. S. administrations, it is primarily a policy adjustment mad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scalating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e policy marks a shift in U. S. maritime policy from the cooperative maritime power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toward the competitive maritime power of the era of great-power rivalry. Althoug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policy of sea power revival will face numerous constraints, its move to bring the maritime domain into the orbit of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s bound to profoundly reshape the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landscape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industry, while also confronting China's drive to become a strong maritime country with a more complex environment.

Keywords: Donald Trump; sea power; maritime industry; maritime transport; ocean governance; strategic chokepoi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 Security Perceptions and Policy Practices under the U. S. -Israel-Iran Conflict / Zhang Jie / 20

Following a series of shocks to Southeast Asia caused by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Trump 2.0 administration's Asia-Pacific policy shift, the U. S. -Israel-Iran conflict that broke out in February 2026 has posed a new round of compound shocks to regional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curity perceptions and the adjustment of security strategies among regional states. Based on their perception tha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s returning to a "law of the jungle" era,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traditional security, including formulating, updating, or upgrading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ies, raising military expenditure, priorit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unmanned systems, and strengthening 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 capabilities. Nevertheless, the security strategies of Southeast Asian states still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of defensive realism. In this context, China should make precise assessments and adopt differentiated policy responses based o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pecific issues, so as to safeguard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its neighbor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Keywords: U. S. -Israel-Iran conflict;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great power rivalry; law of the jungle; security perceptions

Open and Embedded Min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European Union's Practice and Limit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 Ma Bo / 38

In recent years, the European Union (EU) and its key member states have progressively deepened their substantive engagement in "Indo-Pacific" security affairs by issuing "Indo-Pacific" strategy documents, advancing naval deployments, and implementing security capacity-building pro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ilateralism,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analytical concept of "open and embedded min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 examine the EU's security cooperation model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its practical forms, formative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order. The model takes capacity building as its core content, institutional embedding as its principal pathway, limited power projection as a sup-